
中外劳动研究评论(第一辑)
Comparative Labor Studies Review

中国劳动关系的新趋势
Emerging Trends in Labor Relations (Volume One)

编辑: 罗斯琦

Editor: Siqu Luo

主编: 何高潮, 关少兰

Editors-in-Chief: Gaochao He, Katie Quan

劳工反抗的历史和未来

——评《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田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文版《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是一本迟到的著作。本书的英文版 2003 年在美国出版，2005 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至少在 2010 年由作者的中国学生，也就是本书现在的中文译者张璐译出。就在这一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南海本田罢工发生了，进而引发了珠三角汽车行业的罢工潮，这多少改变了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为中文版撰写序言的进程，她认为有必要将最新的中国经验包含进中文版的序言中，但又不能匆忙地就新情况做出结论，直到一年后序言完成，西尔弗的著作才得以以中文面世。

作为一个提出理论并希望这一理论可以成功预见未来的研究者，贝弗里·西尔弗完全有理由为在中国上演的工人抗争激动而踌躇笔端。长久以来，中国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被认为是顺从和无力、在资本与国家面前脆弱而缺乏战斗性的群体。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廉价而逆来顺受的劳动力和他们糟糕的工作条件，拉低了世界总体水平，使得其他国家曾经享有优越待遇的工人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严苛要求。2010 年的罢工事件却展示了这些工人改善经济和权利地位的强烈愿望及力量，成为对上述观念所基于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理论的反驳。而西尔弗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资本转移到哪里，劳工反抗就会紧跟到哪里。”这一简洁的结论除了其本身之外，至少在两方面与以往流行的全球化劳工研究的文献不同，并对审视现在的状况提供了启发性的视角。首先，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动如何影响劳工反抗运动，须在更长的历史变迁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变换的互动过程中进行考察，才能把握其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和新趋势。作为“世界体系”理论流派重要成员之一，贝弗里·西尔弗继承了从布罗代尔到沃勒斯坦等人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整体分析的方法。基于这种研究视角，西尔弗与她在“世界劳工研究小组”的同伴从 1986 年开始建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这个小组的信息收集工作一直持续到 1996 年，记录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的劳工抗争事件，使西尔弗的研究建立在令人惊叹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另外，在西尔弗看来，工人的抗争运动并非处于被动地位，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结构变动的因变量，而是具有主体性的、积极的影响力量，其身影显现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或政治变动之际，在“被塑造”的同时，也“塑造”了全球经济与政治形态。在这些分析中，西尔弗结合了马克思和波兰尼的劳工反抗与资本积累关系理论，将这两种理论描述的现象视为并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

存和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经验数据收集的指导。通过本书对丰富的劳工抗争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反映那些对无产阶级化和资本剥削与异化的反抗，与波兰尼式的抗争——表明源于社会本身的、反抗极端商品化倾向的反向运动，是如何在不同时空上演的。

在分析资本空间转移时，西尔弗参考了大卫·哈维的“空间调整”概念。这一概念同时包含一种见解，即资本的空间流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只是在时间上延缓了危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与“空间调整”概念背后的观念一致，本书中展示的世界劳工抗争浪潮的图景，表明资本的空间转移也无法永久地削弱劳工抗争的力量。西尔弗描绘了 20 世纪的主导产业汽车行业变迁与其工人斗争的轨迹。汽车制造业最初在美国兴起，成为利润的最大制造者，同时造成了大批半技术的汽车工人。马克思式的反抗以底特律为中心兴起。这些抗争运动赢得了显著胜利，对利润率造成了挤压，资本和生产开始向欧洲、韩国等地区转移。但是很快，这些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劳工反抗浪潮，并驱使资本进一步向巴西、南非等地转移，同样的工人反抗运动也继而在这些国家爆发，甚至带有更强的危险性。每一次资本转移，虽然会暂时削弱迁出地的劳工抗争，消解（unmake）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引起波兰尼式的反抗，同时也会在迁入地生产出大批产业工人，并赋予和增强这些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为新一轮劳工运动的兴起创造条件。在这里，西尔弗考察了两种工人力量，一种被称为制度性力量，另一种被称为结构性力量。前者来源于基于现存制度的工人组织，如工会，后者来源于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例如掌握资本生产必需的稀缺技术的市场谈判力和在关键产业的核心环节中从事生产的工作场所谈判力。与此相对，资本在空间转移策略之外，还运用技术调整、产品调整和金融调整等手段不断制造新的利润空间和打破原来的劳资力量平衡。西尔弗在对纺织业和汽车制造业这两个先后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的分析中，描述了这些策略承继交叠并与劳工运动互相影响的复杂情形。从纺织业到汽车生产，资本这一次大的产品调整，伴随着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出现，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同时也伴随着具有更强大的结构性力量的工人运动的兴起。但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些调整是以重新划分界线的面貌出现的。在拥有创新性产品的地方，资本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更强，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与获得强大反抗能力的工人达成妥协，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和稳定，随着资本和技术转移在时间和空间上推进，位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利润空间变小，在达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契约上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梳理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集便是，“资本主义新的主导产业将是什么，以及这一产业将会在哪里腾飞，它会不会制造出另一轮劳工运动的浪潮，而对整个经济和秩序进行重塑”？西尔弗考察了其中几种可能性，也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足了空间。

对经济结构变动的研究，回应了认为资本高速流动性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无组织”工人，并使他们激烈竞争，从而直接威胁到劳工运动的观点。资本流动也从间接方面对工人运动构成威胁，通过削弱国家对工人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保护，来削弱工人对抗资本的力量。作为对劳工运动间接威胁的回应，西尔弗分析了工人运动与本国政治以及世界政治的关系。工人运动不是消极的受影响对象，它会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塑造政治发展的路径和国际秩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新兴发达国家韩国，或是在巴西和南非，劳工抗争以各种形式与本国政治进程交织在一起。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韩国工人阶级争取降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待遇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抗争，与本国争取民主化的学生运动紧密联合，改变了韩国政治的面貌。在南非，外国资本进入和国内种族隔离政策共同造就了以黑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这些工人反抗资本压榨和建立非种族隔离工会的行动，成为废除种族隔离，建立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的重要部分。将劳工反抗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革因素，对理解现在变局提供了重要线索。民主化理论，大量讨论市场化、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化的关系，却长期忽略产业关系和工人运动对民主化的可能影响。如果已经发生的激烈劳工反抗运动可以被看作更大的反抗运动浪潮的征兆，它将对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位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变化，西尔弗提供的框架和方法也许可能激发对这一关系的深入研究。

尽管本书对于其宏观取向未能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工人运动不同的背景、动力机制和过程进行详细考察的局限有着充分的自觉，不同的文化、经济传统，特别是国内政治特征将如何影响这些劳工反抗的动力机制，仍然有可能对西尔弗的研究提出一定挑战。就像裴宜理在对 20 世纪初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中表明的，虽然“工人运动的危险性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巨大的经济破坏能力”，但蕴藏在工人阶级自身中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前现代因素，以及政党政治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形态，即使这是一个塑造与被塑造相互作用的过程，国共两党政治策略及其特征很大程度上被上述传统因素所塑造。本书在这方面的局限有可能在评估劳工反抗时产生偏差。书中讨论的工人结构性力量和组织性力量，可能被其他因素制约或扭曲，另一方面，劳工反抗也有可能从其他地方汲取力量，从资本主义秩序边缘获得动员的驱动力和手段。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前景的预测似乎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正如“没有一个平坦的运动场，让劳工抗争平衡上演”一样，资本流动的地理空间也不是平坦的舞台。乔万尼·阿里吉在西尔弗参与的一本书——《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曾讨论西方与东方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异，他在更晚的著述中，关注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独特发展路径，在阿里吉看来，东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大程度上调动了人力资源而不是非人力资源、保留了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独立性。这令人想起，逃逸于本书之外的特例，日本。这一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未出现在西尔弗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浪潮发生的地图中。对中国来说，现代化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之上，

土地改革在农民中实现了平等的土地分配，在这一基础上现代化为农业生产者保留土地留下了空间。资本主义如何在这里发展，与工人运动一样，需要更深入地观察和研究。不过本书在这方面，与其说是不足，不如说是益处所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激发更多对于劳工抗争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变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美〕贝弗里·J. 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 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